

吴光 主编

浙江文史新论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九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光 主编

汪逸芳 执行主编

浙江文史新论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九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 主办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文史新论 / 吴光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9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ISBN 978-7-5325-6408-8

I. ①浙… II. ①吴… III. ①文化史—浙江省 IV. ①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0446 号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九辑)

浙江文史新论

吴 光 主编

汪逸芳 执行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268,000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6408-8

B·774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九辑)
《浙江文史新论》编辑委员会

特邀顾问:梁平波 潘海生

名誉主编:魏新民

主 编:吴 光

执行主编:汪逸芳

编委会委员:吴 光 龚鹏程 赵昌平 王兴康
郭学焕 黄朴民 周桂钿 姜广辉
梁 涛 罗义俊 陈卫平 邵鸿烈
汪逸芳 王福和 董 平 徐 斌
严 军 宫云维 罗 颢

责任编辑:罗 颢

主办单位:浙江省文史研究馆

前言

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丝茶之府，文物之邦，人文渊薮”的盛誉。鱼、米、丝、茶是经济，“鱼米之乡，丝茶之府”说明浙江的经济历来比较发达。而文物、人文是文化、是精神，“文物之邦，人文渊薮”的称誉是对浙江历史上文化繁荣景象的肯定。在这样的历史人文背景下，浙江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能占一席之地的历史文化名人与学派，其中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如王充、陈亮、叶适、吕祖谦、刘基、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龚自珍、章太炎等，史学家如赵晔、王应麟、邵廷采、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王国维等，经学家如虞翻、万斯大、毛奇龄、俞樾、马一浮等，文学家如、吴均、虞信、贺知章、陆游、宋濂、吕留良、鲁迅、郁达夫、徐志摩、茅盾等，教育家如胡瑗、张履祥、蔡元培、陶行知、马寅初、张其昀等，科学家如沈括、陈訐、黄炳堃、竺可桢等，宗教人物如魏伯阳、张伯瑞、贯休、寒山子、傅大士、司马承贞、杜道坚、弘一法师、太虚法师等，可谓名人辈出、群星灿烂。浙江历史上的学派，则有南宋浙东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四明学派）、明代阳明学派、明末蕺山学派、清代浙东经史学派以及佛教天台宗、全真道教龙门派等，以及浙江诗派、浙西词派等等，也可谓学派林立。在经济层面，浙江历

史上有著名的龙游商帮、宁波红帮、当代浙商群体,政治层面则有兴中会、光复会等政治社团。如此等等,都从不同的领域与角度反映了浙江历史文化的多姿多彩。

以往对于浙江绚丽灿烂的历史文化的研究探讨,已经硕果累累,成就卓著。但历史真相总是忽隐忽现,若晦若明,学术研究也就推陈出新、永无止境,何况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尚待探索,存在不少文明遗珠值得拾取。我们这部《浙江文史新论》,即以浙江文史为重点,兼及于中国历史文化,收录了文史学者的40余篇文章。我们将这40余篇文章分为“思想文化史论”、“经济史论”、“文史散论”、“国学新论”四大块,前三块主要是研究浙江历史文化的文章,有研究“浙学”内涵、特色与基本精神的,有研究浙江古今人物的生平、著述与思想成就的,有研究浙江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与特色的,有讨论浙江文化史上著名人物的具体成就与作品特色的,后一块是研究国学的内涵、特色、精神及其现代价值的。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浙江籍和长期在浙江从事学术工作的文史学者,或非浙籍但研究浙江历史文化的,而名之曰“新论”者,有命题之新,有见解之新,有资料之新,其中多数文章都有拾遗补阙、阐幽发微的作用,有的文章则提出了重要的学术创见。例如,吴光《论浙江文化的起源、演变、特色与基本精神》一文系统论述了浙江文化从起源、成型到发展、繁荣乃至转型的历史进程,并总结出浙江文化的六大精神,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多元和谐精神;“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民本精神;“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求真务实精神;“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放创业精神;“工商为本,诚实守信”的商业精神;“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教兴邦精神。其《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一文则着重论述了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民主启蒙性质,指出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可能

路径是“从民本走向民主”。其《中华和谐文化三论》则论述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三家的“和谐”思想的基本特色,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为宗旨的“多元和谐”文化观。邵鸿烈的《南宋时期浙学的辉煌》一文着重论述了南宋浙学的特色、精神及其对现代的启示意义,作者认为南宋浙学的基本特色是崇尚事实功主张学以致用,反对重义轻利、主张义利双行,反对以农抑商,主张农商一事,主张以经通史、富有批判精神等等。在台湾的浙籍学者戴琯璋所撰《关于人文的省思》一文则精辟分析了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的不同特点,指出“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其实都是人类理性的表现……前者为实践理性,后者为思辨理性。两者虽然面向不同,却关系密切,不可分割。重人文而轻科学,导致迂阔而不切实际;重科学而轻人文,则导致冷峻而不近人情”,并指出“个人生活人文化、人文教育生活化、人文学术生命化,是当今人文领域返本开新必须关注的三个层面,而一以贯之支撑着这三个层面的,则是活泼昭明的主体心之所感、所觉与所悟”。台湾学者龚鹏程的《马一浮章太炎的国学观之比较研究》则慧眼独具地论述和比较了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马一浮的国学观的内涵与特色。郑晓江的《“讲会”与儒学教育》一文从批判当今教育体制的弊端入手论述了恢复儒家传统“讲会”的重要意义,指出“儒家的‘讲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及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其独特之求道的内容和悠游山水之间的形式,在今日恢复儒家讲会的传统既是克服当前教育弊端之必须,对培育青年学子的道德人格与思想境界也是十分迫切的”。张弛《撷取道家教育的人文之花》则颇为中肯地比较了儒家人文教育思想与道家人文教育思想的不同特点,指出“儒家尚人为,道家尚自然;儒家尚理性,道家尚直觉;儒家尚实用,道家尚思辨;

儒家尚启发,道家尚辩证……这些明显的差异,恰恰构成了互补的条件,使这两大教育流派的人文传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两条并行的文化巨流”、“道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华,从道家教育宝库中吸取智慧,继承、弘扬其人文传统,进而作出新的诠释和发展,这对于我们转变教育观念和进行教育改革,将大有裨益”。……如此等等,都闪烁着作者的深刻洞见,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理论思维的高度。读者倘能从这些文章中受到启发,进而推进某个领域或某人某事的研究走向深化或得以解决,则本书编者之愿足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是从近年发表于浙江文史研究馆主办的学术刊物《古今谈》文章选辑而来,由于编者视野与水平所限,未免有取材片面、挂一漏万之病,敬希读者不吝指教。

是为序。

编者

2012年4月15日

目 录

前言	编 者(1)
----------	----------

· 思想文化史论 ·

论浙江文化的起源、演变、特色与基本精神	吴 光(3)
南宋时期“浙学”的辉煌	邵鸿烈(25)
作为人和作为思想家的陈亮	卢敦基(37)
寒山思想、理念和情操之研究	
——试论天台山和合文化	叶哲明(47)
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	吴 光(62)
黄宗羲的“本体工夫”论初探	
——从工夫中见本体	张宏敏(71)
王国维文艺批评中的康德哲学传统	杨振宇(79)
马一浮先生的文化诗学观	吕洪年 楼 培(93)

· 经 济 史 论 ·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	何茂春(105)
简论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及特点	柳和勇(122)
东吴卫温诸葛直从章安古港远规海外及到达台湾	
之研究	叶哲明(131)
文脉与商脉——宁波商帮的人文坐标	王耀成(142)
宁波帮金融家在上海的兴起	秦亢宗(152)
浙江经济发展与浙江精神简议	邵鸿烈(159)

·文 史 散 论·

良渚方国及图腾源流考 柴海生(175)

陆游为韩侂胄写“两记”而“见讥清议”之浅见
..... 应守岩(184)

山水之间

——关于《富春山居图》 蔡 琴(193)

胡三省的卓识才华及其对政论史学的贡献 叶哲明(203)

从“三言二拍”看宋元时期的杭州城 郭 梅(215)

“钱塘书会才人”施耐庵 龚玉和 单金发(224)

《金瓶梅》中宋元杭州吴语方言考 杨子华(234)

民俗学视野中的罗隐及其传说、故事 吕洪年(242)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家史补订 马大成(250)

光影千年说源起

——对皮影戏产生的多角度考察 沈 珉(257)

古代女子佩饰渊源谈 王 静(265)

·国 学 新 论·

中华和谐文化三论 吴 光(277)

关于人文的省思 戴珏璋(288)

马一浮、章太炎的国学观之比较研究 龚鹏程(304)

“讲会”与儒学教育 郑晓江(329)

撷取道家教育的人文之花 张 弛(341)

中国文化的特质 周 涛(350)

本书作者简介 (359)

·思想文化史论·

论浙江文化的起源、演变、 特色与基本精神

吴 光

浙江是古代东夷族、古越族繁衍生息、兴邦立业的土地,现在则是 5000 余万浙江人生产生活、创业发展的物质基地与精神家园。浙江历史悠久,环境宜居,物阜民丰,人文荟萃。浙江文化既蕴涵了中华文化的共性,也承载着地域文化的个性。本文在论述浙江文化的起源、发展、演变、转型的基础上,力求总结浙江文化的特色及其基本精神,并阐明浙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大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浙江文化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繁荣

1. 起源与演变——从史前到隋唐的浙江文化

浙江素有“鱼米之乡,丝茶之府,文物之邦,人文渊薮”的盛誉。鱼、米、丝、茶是经济,文物、人文是文化,经济与文化是一个辩证的互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经济发展的水平看文化,从

文化繁荣的程度看经济。但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文化上。而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与制度习俗,包括民族精神活动的方式、精神活动成果及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精神文明传统。

为了清楚揭示浙江文化的脉络与特色,我们还得从源头说起。

浙江是有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已经确证:至少在十万年前,已有人类在今浙江建德一带居住(被称为“建德人”)。而在浙江发掘的人类文化遗存,如浦江上山文化和萧山跨湖桥文化,则将浙江史前文化的历史推进到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而最有代表性的史前文化是距今七千到六千年左右的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嘉兴马家浜文化和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杭州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明遗存、干栏式建筑群表明浙江的先民已经从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良渚文化则反映浙江先民创建了一个玉器文明时代。这些史前文明遗存的发掘,以其在当时绝对先进的稻作技术与复杂的制陶、制玉工艺和打制、磨制、编制的石器、骨器、木器、竹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干栏式建筑模式,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宣告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太湖流域与钱塘江流域文明历史的悠久与发达。而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异日”象牙雕刻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羽冠、人面、兽身”三位一体的玉琮,象征着浙江先民的太阳崇拜、朱鸟崇拜与向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观念,也是“人化自然”的证据。

然而标志浙江先民进入文明社会的有力证据,则是由《国语·越语》、《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记载的古越国的历史与文化,以及从地下发掘的反映古越文化的大量实物证据。

人们之所以把“浙江文化”称为“越文化”或“吴越文化”，是因为浙江的历史是与古越族、越国、吴国及吴越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吴”、“越”的称谓始于殷、周之际。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越绝书》等书记载，大约三千一百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了避让王位而东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好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后来，周武王伐纣胜利后，“追封太伯于吴”。到吴王阖庐时，国势强盛，乃筑大小二吴城。其子夫差，一度称霸于诸侯，国土及于今之江、浙、鲁、皖数省。至于“越”之缘起，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所载，是因夏禹死后葬于会稽（今绍兴建有“大禹陵”），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句践父子，自立为越王，号“於越”（“於”读作“乌”，“乌”同“鸟”，是古越族以“鸟”为族徽或图腾的证明）。春秋战国时吴越争霸，先是吴胜越败，越王句践被迫向吴王夫差称臣纳贡。后来，句践忍辱负重，积聚力量，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举灭吴，称霸诸侯，留下了浙江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古越文化的历史文化意义，不在于句践君臣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具体史迹，而是“卧薪尝胆”故事所体现的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故事所体现的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爱民精神。而越国大夫范蠡为句践“兴越灭吴”事业出谋划策、胜利以后急流勇退经商成功的故事所体现的，则是审时度势、适时进取的创业精神，是预测市场变化、使农商都能获利的均衡发展思想，是事业成功、富而好德、回馈社会的崇高精神。这就是文化软实力，是历久弥新的人文精神。

汉唐之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中原”地区，文化上也以秦晋、齐鲁文化为主导。但浙江地区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并涌现了像东汉王充（27—97，浙东上虞人）这样纵观大局、

具有恢弘气度与深刻思想的通儒以及魏晋六朝世代传承的余姚虞氏这样的经学名家,也产生了以记载与总结地方历史文化为己任的袁康、吴平、赵晔这样的史学名家。

王充在《论衡》中所体现的“实事疾妄”⁽¹⁾方法论,开创了浙江思想史上求真务实、批判虚妄、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其学兼容儒、墨、道、法而又有批判创新的特色,为后起的“浙学”树立了多元兼容的优良传统,他在政治上提出的“文武张设,德力具足”的治国之道,对后世浙学崇义养利、追求事功的传统起了先导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视王充为“浙学”的“开山祖”,将滥觞于王充的浙学精神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²⁾

在汉魏时期的会稽文化名人中,还有经学名家虞翻(164—233)、虞喜(281—356)、虞预(285—340)、韩说(汉顺帝、灵帝时山阴人),史学名家袁康、吴平、赵晔等人⁽³⁾。其成就表明,浙江从汉代开始,便形成了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而以古越都城为中心的会稽—山阴—余姚一带,则形成了汉魏时期的浙江文化轴心,对浙江文化特色的形成影响极大。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经历了从社会动荡、民族交战走向国家重新统一、民族融合共处、文化交融重建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玄学、道教、佛教与西域文化构成对儒家文化的严重挑战,形成了“三教”既互相批判排斥又互动互补的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局面。浙江地域文化以晋室南迁、“衣冠南渡”为契机,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互动交融而获得长足发展并形成显著特征的时期。

魏晋时期,以道安、支遁等为代表的佛教界著名人士,同时也是谈玄名家,他们以“名士”身份与士人相交往。或许可以说,佛教作为一种新思想形态的最初传入虽然不在浙江,但它

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交融形成思想的新形态,最终导致“中国化佛教”的出现,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浙江完成的。陈隋之际,由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既成为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研究成果的宏观总结,又预示了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佛教的传入及其在浙江的发展,对道教的传播与理论创造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浙江学者的贡献颇巨。顾欢的《夷夏论》体现了一种对异质文化的认知,至陆修静整理道教科仪成为典范,司马承祯南下浙江,自号“天台白云子”,终于建立了浙江道教新宗派。

对于南渡的士人而言,浙江的自然山水成为其审美情趣与无尽玄思的对象。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其上,若云兴霞蔚”已成千古名句。⁽⁴⁾正是这种置身于美丽山水之中而触发的独特情怀,促成了中国诗歌、绘画、书法艺术的山水情怀,从而有了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文的硕果。而属于南渡士人的山水画家顾恺之(无锡人)、山水诗人谢灵运(上虞人)、以脍炙人口的《兰亭序》奠定书圣地位的王羲之(山阴人)、以建立“四声八病”著名的沈约(吴兴人)则成为杰出的代表。

隋、唐、五代时期的浙江文化,最大亮点是在佛、道二教的文化创新上。

唐代的中国是封建社会时期在宗教与文化方面开放度最高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的时期。大唐时期佛教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文化是个强大挑战,对道教文化的发展也是莫大刺激,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以“三教鼎立”为特征的多元并进与互动交融的局面。这是当时浙江文化呈现佛道兴盛、三教交融态势的文化背景。

隋唐时期,佛教天台宗已经成为中国佛教诸宗派当中的主